

## 導讀：關於《許壽裳日記》

北岡正子 黃英哲 合撰

一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葦），浙江紹興人，曾就讀杭州求是書院。一九〇二年九月，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就讀，在那裡，結識同鄉周樹人（後來的魯迅）。之後，兩人深摯的友情直到魯迅去世（1936年）。一九〇四年三月，從弘文學院畢業，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習「教育、地理、西洋史」，於一九〇八年三月畢業。這段期間，他以行動反清，擔任同鄉會雜誌《浙江潮》（1903年創刊）的編務，以鼓吹革命思想為己任，並加入光復會以及爾後成立的中國同盟會（1905年）。許壽裳和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時，就一致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唯賴革命，留學時代的後半期，和魯迅一起生活，並著手準備文藝運動，但是沒有成功。在同一時期，他和魯迅等數人，同去旁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注》講學。章太炎和在求是書院邂逅的蔡元培，都是許壽裳生涯最尊敬的師長。許壽裳原有留學德國之意，曾和魯迅結伴同往獨逸學協會學校辦的獨逸語（即德語）專修學校，上了短時間的德語課，然而留德願望沒能實現。一九〇九年，許壽裳回國，任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之後，魯迅也返國，在同校擔任生理學、化學老師，兩人共事了一段時間。

辛亥革命過後，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立刻聘請許壽裳到南京的教育部工作，在這裡，再度和魯迅同事。隨著遷都，許壽裳也跟著教育部的轉移遷住北京，擔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長。此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先後歷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要職。他

在教育部，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時，一遇到教育或政治的重大事件，必和魯迅攜手面對困難，同甘共苦。一九二五年，因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排斥校長運動，引發教育界新舊兩派對立的所謂女師大事件時，魯迅支援學生的抗議運動，被免職，許壽裳立刻起而聲援，反對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同樣遭到免職。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民眾示威抗議包含日本的八國列強以武力威嚇，向中國發出撤除大沽口國防工事等最後通牒，反對北洋段祺瑞政府的懦弱外交態度，北洋政府軍警對著抗議民眾開槍，造成重大死傷。因「三一八事件」北洋政府發出的逮捕令中，大學教授就有五十名，許壽裳和魯迅也名列其中，他倆歷經逃難生活後終於各自逃離北京。另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因蔣介石的清黨使中山大學也有數十名學生遭逮捕，許壽裳和魯迅因校方未出手援救，辭職表示抗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十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在西安成立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受聘為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一九三八年，西安臨時大學因戰亂轉移到漢中，改名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兼法商學院院長，不久，因受到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干涉，憤而辭去院長職，專任史學系教授。一九三九年，西北聯合大學改組為西北大學時，許壽裳辭職，同年冬天，前往雲南，再度成為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因戰禍，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到雲南的澂江）。一九四〇年春天，應私立華西協合大學（成都）的邀請，以庚款（英國義和團賠償金所設）講座教授身分前往執教。一九四一年夏天辭去華西協合大學，赴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秘書，後升任專門委員，重溫公務員生活。

抗戰勝利後，許壽裳回到南京，雖得與九年未見的上海家族團圓，但旋於一九四六年，接受老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邀請赴臺。赴臺後的許壽裳，歷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等職，一九四八年

二月，離奇死於臺灣大學宿舍。

許壽裳經歷戰前、戰中、戰後，足跡遍及日本、中國、臺灣。他的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許壽裳的日記，是從他任教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開始，止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去逝於臺灣大學教授任內為止，從五十七歲到六十五歲的紀錄，映照了許壽裳在戰時大後方經驗和戰後的臺灣經驗。

## 二

一九三七年十月，許壽裳隻身前往大後方。從西安到漢中、城固、澱江、成都、重慶輾轉遷徙，度過遠離家人將近十年的辛酸歲月。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在舊曆中秋的日記裡，記載了如下的感慨：

近年來，南北東西，不遑寧處。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六在嘉興，時正為安頓眷屬，收拾行裝，終日杳杳，對月黯然，數日後即冒險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傳家場，不久飛滇。今年在此，極感蕭殫，妻子流離，相隔萬里，在蓉者惟孀兒一人而已。

從目前公開的日記裡，可以了解是記載了在大後方成都、重慶後半期約五年的生活。日記中，鉅細靡遺地記錄了有關書信往返、金錢收支、人物往來、起居、讀書、著述、工作等事情。此外，也會因觸景傷情而寫下如上述般的感慨。

首先，戰爭的陰影濃厚地籠罩著這段時期的生活。日記裡精密的記載空襲的次數和時間，與留在上海妻子、女兒的通信日期（從上海到重慶通信時間需一個月以上）和內容，以及親友們的信件等等，具體的浮現了日本軍重複轟炸成都、重慶，生活在日軍占領區中國人生活的困頓和逃避戰亂的人們的身影。例如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日記如此記載：

得兆恆（長女之夫，住在桂林——引用者注）信，謂暫不前進，此次湘桂及黔桂撤退情形之慘，有不忍言。其妹夫楊君一家五口遲兆恆一日離桂（九月十日），至十月八日發信時尚未抵金。又有友人一家七口，困坐車頂上至十七天之久，還算萬幸，其餘擠不上車及中途遺棄者不知凡幾，毫無組織，毫無秩序。又旬日前，車站附近，汽油炸彈庫爆炸，公私損失之大，可謂空前。……

另外，當在上海的女兒經由桂林、貴陽一路找到父親所在的重慶約十個月的日記裡，充分表現了擔心女兒安危及行路困難的父親的心情，令讀者無不動容。

日記不僅記錄了日常戰時的生活，同時也反映出一位抗日知識份子的戰鬥意識。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的日記，敘述了有關抗日戰爭的意義：

……日本已將琉球民族消滅，朝鮮民族奴役，現在又攫擄了越南民族，逼伺著泰族。中華民族的抗戰是日本奴役東亞諸民族的最有力的阻碍與打擊，同時也是東亞諸民族解放希望之所繫。

此外，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的日記，讀了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將魯迅抗議內山太過褒獎中國的段落抄下：「中國的將來，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鬥爭」。又於五日，抄下郁達夫〈憶魯迅〉文中的一段：「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許壽裳並沒有加上自己的感想。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的日記也是去掉感想記下了所聽說的「青年從軍」的苦悶不滿——低級教官不但學識淺薄而且紀律蕩然、操練除一支步槍外一無所有、待遇連理髮一次也不夠、反倒被從軍學生們慰勞的高官之視察慰問等。從上述的日記內容與其抄錄的短文一起解讀，可以窺知許壽裳憂慮著抗日戰爭的未來和戰鬥主體——中國人國民性的改革有密切關聯。

日記中處處可見日本步向戰敗的戰況。美軍空襲東京、名古屋，蘇聯參戰，向廣島投原子彈，聯合國接受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裡，因日本投降及獲知留學美國的次子平安抵美後，寫下兩首欣喜的詩：

昨成詩兩首。八月十日夜聞日寇乞降，翌日得璫兒平安抵華府喜成二首。

居然喜訊聯翩至	黷武倭夷竟乞降
難得八年摧勁虜	從今一德建新邦
陷區妻子狂歌舞	盟國經綸足駿龐
歸路反愁何所見	瘡痍滿地下長江
兒書萬里慰親情	喜報安然抵美京
科學發明原子彈	和平領導國聯盟
厚生能泯貧和富	進德端由愛與誠
羨爾觀光時會好	相期無負此長征

如同詩裡所說，戰後建立「新邦」所需的「愛與誠」，正是許壽裳以前在弘文學院的青春時代和魯迅共同認定是自己民族所欠缺，解脫奴隸性所必要的品德。

其次，可指出的是，許壽裳站在和國民黨內部的C.C.派（以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國民黨內部派系）對立的立場。一九四一年三月，許壽裳堅決回絕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創設的中正學院院長之職，二十一日日記記錄了給朋友謝似顏、朱少卿的信裡，敘述了拒絕的理由：

似顏、少卿學長兄大鑒：自奉灰電，即于十六快復一緘，昨夜奉八日航快書，今晨即復一電，諒均察及。湯公盛意至感，惟院長之職實不能就，前函已懇請其另擇他人，此中不得已苦衷，敢為二兄明言之：弟本參同盟會，且加入國民黨，特以三十餘年來，壹心教育，對於黨務未嘗致力，且不滿于黨內有黨，此為二兄所知，似顏兄共事多年，知之尤稔。自民二七秋，弟兼長法商學院時，教部長別有用意，密電常委，謂院長宜擇超然

者，弟聞之，憤而立刻辭職，從此不欲與陳見面，以弟本性孤介，實難與此公周旋。院長無論如何不能與教部無關係，弟既有此痕跡，恐反累 湯公知人之明，再四思惟決意辭命，務請二兄代為婉達，至感至謝。……

根據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記可了解，中正學院是為教育在戰區不能赴學校的子弟，培養其成為戰時有用人材的學校。湯恩伯是許壽裳老友陳儀所栽培的人物，但也是日後翻弄了陳儀命運的人。如同許壽裳在信裡言及的，如做院長必定和教育部有所瓜葛，實為不想和陳立夫面對，是源於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聯合大學的經驗。

一九三八年七月，任史學系教授的許壽裳兼任了同校法商學院院長，長男世瑛氏的〈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料》22 收錄）裡，針對上述信件的內容有詳細的說明：十一月，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有密電給西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指示，法商學院院長須超越而接近中央者擔任，應暫定由張北海整頓法商學院。其背景源於法商學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更先是北京俄文法商專科學校，因設有俄語課程而對此敏感；加上許壽裳因反對「黨內黨」的存在被視為不服中央者所致。我們如果參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主要教職員履歷表》（民國二十七〔1938〕年十月十四日），可知其中數人有留學蘇聯的經驗，並可看到俄語教師曹聯亞（靖華）的名字。許壽裳得悉密電之事後非常氣憤，立刻辭去院長一職。據聞，當時的西北聯合大學係在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所謂C.C.派的掌握之下。

有關形成上述事件背景的戰時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可參考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1937-1945）》（文史哲出版社，1992）。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於西遷後方的高等教育機關，寄予相當高的關注。在「支援抗戰」、「準備建國」的兩項目標之下，積極地干涉大學教育行政的管理監督。首先，全面劃定大學教育，由中央決定大學

的數目和地域分配，強化監督指導的制度，成立學審會，擴張教育行政權。其次，整頓大學內部的行政組織，確立大學行政的重點，強化內部行政和人員編制的規定，這些措施無非為了嚴厲箝制教育藉以集中權限。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為強化擴大其文教政策，其具體作法是將黨團（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導入校園，各大學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支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集教師和學生組織黨義研究會，促使教育界人士逐漸接觸黨務，也促使自歐美返國的教授們相繼入黨。針對此，也有學者出面批評學校行政和研究自由恐會受影響。教育部長陳立夫譴責新文化運動帶來重視西洋的風氣，深刻地影響了大學教育，稱大學為「文化租界」，揚言要收回租界，而著手整理課程、科目、教材，重視「中國文化」、「中國教材」的大學教育，造成了「復古守舊」的傾向。

許壽裳再三發出堅辭院長的信函，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記又寫著：「……此種訓練機關，教授實難其選，既須富於本科學識，又須深於黨義研究，同時更須濟事實地經驗，三者缺一，則不能達訓練目的，此非普通大學教授所能勝任愉快者。弟個人既無此能力，又不能訪求此項良教授以為輔導，則其餘一切更不必談」。讀了其數日以內所寫的這些書信，從所謂：「對於黨務未嘗致力」，以及適任中正學院教授資格者「須深於黨義研究」為其條件之一，到可是「個人既無此能力」的主旨之中，都可讀出許壽裳絕不苟同C.C.派法西斯主義的教育統制之意志。

許壽裳反對C.C.派的立場延至戰後不曾改變。卻也可能造成日後據聞被阻止擔任臺灣大學校長、陳儀下臺後臺灣省編譯館立刻被廢止，以至於最後的不測之死等的主因。

### 三

一九四六年一月，許壽裳以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第一次復員人員身分，回到南京，和分離九年的上海家人團聚，未幾，即

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的邀請，前往臺灣。

陳儀（原名毅，字公俠或公治，1883-1950）和許壽裳、魯迅同為紹興出身，一九〇二年十月，留學日本，就讀成城學校、陸軍測量學校，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陳儀和許壽裳、魯迅在留學時代即結為好友，一同成為光復會會員，辛亥革命後，出任浙江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九一七年再度赴日，進陸軍大學就讀，返國後在上海企業界任職。不久歷任軍人、政治家要職，許壽裳在重慶任職時期，陳儀正好在此擔任行政院秘書長、國家總動員會議主任，兩人的交往情形可在日記裡讀到。戰後，其政治手腕和留日經歷受到高度評價，被提拔為戰後初期臺灣統治機關的最高負責人。陳儀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渡臺，主持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受降典禮，負責戰後的接收任務。此後，陳儀設立了臺灣省編譯館，聘許壽裳為館長，擔負戰後臺灣文化的重建工作。（有關陳儀的經歷，參考了《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一九八七年，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許壽裳接到陳儀發來的電報，隔天三日的日記裡如此記載：「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復。」陳儀親筆寫信給許壽裳詳敘了對編譯館更進一步的構想（五月十三日書簡）。作為了解設立臺灣省編譯館的趣旨和業務內容是貴重的資料，因此引用如下：

兄願來臺工作，很高興。臺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之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臺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言語文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的關係多不適用。臺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於臺灣人的。第一要編的是中小學文史教本

(略)。第二要編的是中小教師的參考讀物(略)。第三為宣達三民主義與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及辭典等。這是就臺灣的應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覺到中國現在好書太少了，一個大學生或者中學教師要勤求知識，非讀外國書不可，不但費錢而且不便，我常有「譯名著五百部」的志願，(略)為了右面的五種工作，我想設一編譯館。(略)

戰後初期的臺灣雖復歸中國，但基本上仍未脫離日語文化圈。(據推定，日本敗戰前夕，臺灣的日語普及率，幾乎達70%)換句話說，當時的臺灣社會仍是日本社會的一部份。因此，除非通曉日語和日本文化，否則無法在臺灣從事文化工作。在臺灣實施所謂的「心理建設」、「心理改造」，無非是將經日語和日本文化育成的臺灣人的認同，重新改為以中國話和中國文化來達成。許壽裳被期待的重任即在此。

據日記所載，許壽裳是在針對編譯館的工作內容和陳儀幾次書信往返，以及和親友們商量後，作了去臺灣履職的決定。但是，許壽裳下決心的另一個動機，據女兒許世瑋女士的說法，一九四六年初夏，許壽裳覺得南京的政治氣氛不合他意，而告訴家人他要應陳儀之邀赴臺就任編譯館館長。當時臺灣的狀況比較安定，所以認為可實現長年以來想寫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心願，是他決定赴臺的主要原因。(許世瑋〈憶先父許壽裳〉《魯迅研究資料》14,1984收錄)。這個願望的確是魯迅歿後，許壽裳長年所想，從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即可得知：

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于簡略，不慊于懷，思為作傳，則又苦于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

此外，一九四三年也曾被催促寫魯迅傳(二月二十三日

記)。

到了臺灣的許壽裳，投注心力進行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對於在臺灣傳播魯迅思想居功厥偉。並將此和作為編譯館要務的臺灣文化重建——「心理建設」，做了有機性的結合。

身為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為使業務能早日上軌道，備嘗辛苦，這在日記裡隨處可見。日記顯示，許壽裳赴任不到十天即打電報給李霽野，另外不到一個月，又考慮到為了臺灣研究，必須在日本學者返國前著手共同作業。許壽裳認為日本在臺灣的臺灣研究，應該加以整理編譯、接收，使其成為此後發展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有用材料。換言之，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其中文化與資料化的以挪用為接收之構想，這與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理念並不相悖。許壽裳抵臺後即積極的處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成果，其七月十一日的日記即記下「晚至現代週刊談，與達夫（陳兼善，時任臺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博物館館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剛，時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圖書館館長）及廷英（馬廷英，時任臺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談臺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七月二十四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康，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臺灣關係誌料小解》。」臺灣省編譯館設有四組：（一）學校教材組、（二）社會讀物組、（三）名著編譯組、（四）臺灣研究組。許壽裳延攬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窗程璟與謝似顏，分別擔任編纂兼學校教材組與社會讀物組主任，名著編譯組的工作，許壽裳延攬了昔日魯迅創立的文學團體「未名社」的重要成員，俄國文學家李霽野來臺擔任編纂兼主任，臺灣研究組的主任，許壽裳則延攬了臺灣出身的學者楊雲萍擔任。學校教材組的成員中有日後成為中國神話研究大家的袁珂（袁聖時），是許壽裳華

西協合大學時代的學生，名著編譯組的成員則有著名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者李何林（李竹年），日後返回中國曾任南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臺灣研究組且徵用了一批日本學者，如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素木得一、前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臺灣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標本製作版畫家立石鐵臣等。許壽裳時常和陳儀或其秘書見面，關於編譯館的營運、設備、經費、人事、出版等事項，交換意見，獲得支援推展工作。十月初，李霽野抵臺，十二月李何林也抵臺。同年十月，許壽裳設宴款待臺灣研究組的日本成員淺井惠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人。眼見主要人員都已到齊正待施展業務，卻實際千頭萬緒。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許壽裳在日記裡這麼寫著：「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陳種種困難：（一）本館館舍、（二）職員宿舍、（三）宿舍傢具、（四）交通車及小汽車、（五）宴會請柬。請其婉告主管人員，對於本館工作之特殊性質加以認識，本館事務現狀之特別困難加以瞭解，切弗漠視。」

另外，日記也記錄了許壽裳在事務方面，和新教科書的編輯委員會及教育關係者舉行座談會，說明臺灣省編譯館的方針等情形。

然而，苦心經營且已上軌道的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卻在一九四七年，臺灣民眾因不滿戰後施政而爆發二二八事件後，受挫以致停頓。

事件發生後，許壽裳到臺灣省編譯館辦公的情形，最初記在日記裡是三月十二日，但是翌日下午發燒到三十八度，連續幾天身體不適。二十八日，兩名館員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許壽裳為了其中一個釋放較慢的館員，去見陳儀，要求妥善處理，四月七日，這名館員終獲釋放。四月，社會讀物組編輯的《光復文庫》出版了幾本，可知其絕對不是在事件之後才編輯的。還有，四月八日，行政長官公署轉達給許壽裳編輯一千種國民文庫的計劃，也因後來公署、編譯館的廢止而不得不使工

作停頓。

四月二十二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遭廢止，改組為省政府，陳儀下臺，由魏道明接任臺灣省主席。二十四日，許壽裳向陳儀提出辭呈，陳儀雖未接受，但結果如同去職。五月十一日，陳儀離臺，許壽裳赴松山機場送行。五月十五日，魏道明抵臺，十七日，許壽裳從報紙得知前一日十六日在省政府會議中已決定廢止臺灣省編譯館，這是無視館長存在的一項決定。五月十七日的日記許壽裳如此寫著：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

更進一步，在臺灣省編譯館歸劃給教育廳的翌日，即來臺一年後的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裡，記載了被政情的變化播弄功虧一簣一年來的辛勞：「來台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日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

事態演變至此也許已經早就預料到吧！陳儀剛離臺之後，曾試探許壽裳的臺灣大學寄來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聘書。據臺大同學會的《會員名簿》（民國三十六〔1947〕年八月一日）記載，任職國立臺灣大學的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及農學院、工學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等，都出身浙江省。臺大寄來聘書，可說出自校長陸志鴻和中國文學系教授臺靜農等人的關心，牽掛許壽裳安危。許壽裳自從在西北聯合大學和陳立夫發生衝突，短時間在中山大學任教以來，就不曾在教育部管轄下的公立大學執教，而且據聞戰後，陳儀曾力薦他做臺灣大學校長，也因遭教育部反對而未能實現（1945年12月27

日的日記，可見和此有關的記載）。當時，許壽裳得以轉任臺大教職一事，C.C.派可能未向陸志鴻表達意向。

據日記記載，許壽裳七月開始在臺灣大學工作，為中國文學系首任系主任，很快的就參與入學考試的計分和判定等業務，從日記中，能夠略知許壽裳為草創時期中國文學系忙碌、奮鬥的情形，十二月十二日日記即記下「出席校務會議，于本系研究設備費嚴詞爭之。」許壽裳在被臺灣大學聘請後，立刻為曾在臺灣省編譯館攜手共事的同事們奔走覓事，從六月到八月先後聘請國分直一（歷史系副教授）、立石鐵臣（歷史系講師）、李霽野（共同科教授）、李何林（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楊雲萍（歷史系教授）等人，到臺灣大學任教。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或十九日凌晨），許壽裳在大學宿舍遭人殺害，結束六十五歲的生涯。根據《臺灣新生報》（1948年2月23日）所登載警務處的公開發表，是因為原臺灣省編譯館工友高萬俤，潛入許壽裳宅偷竊，遭發現而行兇。《臺灣新生報》的標題如此寫道：「許壽裳教授被殺案，兇手就擒真相大白，殺人犯是前工友高萬俤，警務人員全體出動三日半破案」。許壽裳遇害的二月，大學和宿舍遭竊，而在「三日半」之間，他的親友皆遭到難以理解的調查（許世瑋〈讀李陳關於我父親許壽裳在臺被殺是政治性暗殺二文後〉原載《觀察》半月刊第6卷第12期，1950年4月16日，收錄於《魯迅研究資料》14，天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按：李陳二文指李何林〈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臺被殺是政治性暗殺的種種事實〉、陳醒民〈許壽裳案的審判人對於李何林文的補充〉，皆收錄於《魯迅研究資料》14）。總之，許壽裳之死仍留下不少謎點。

那晚，許壽裳是寫完日記後就寢的吧？二月十八日簡短的記載成為許壽裳日記最後、突然的絕筆。

#### 四

現在，我們研究魯迅時，許壽裳有關魯迅的文章，無疑提供了我們第一手資料。從日記能夠得知許壽裳關於魯迅的大半著述，實際上都是在臺灣，任職臺灣省編譯館時所寫，這是必須一提的。因為戰後臺灣的生活，對許壽裳而言，和之前的戰時流亡生活相比，儘管可以說有穩定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認許壽裳視為己任的臺灣文化重建，委實是根植於魯迅精神之上。

結集了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文章的單行本有三種：《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1947年6月，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1952年6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亡友魯迅印象記》（1947年10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前兩本因各自收錄了許壽裳散見各處的文章集輯成冊，所以同一標題的文章重複收錄了不少，但字句的表現可看出有不一樣的部份。我們認為許壽裳去逝後出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裡的若干篇文章，不知何種理由被作者以外的人修改過。《亡友魯迅印象記》是應許廣平之託，來臺前，每章分數回寫共二十五篇，在上海經許廣平奔走斡旋後出版了單行本。其他，還有幾篇沒收錄在單行本的文章。

以下是根據日記、關係資料，製成的許壽裳關於魯迅的著述活動之一覽表。

許壽裳 魯迅關係著作一覽表（稿）

凡例

- (一)《魯迅的思想與生活》 略號→A
- (二)《我所認識的魯迅》（52, 53, 78，略號→B—52, 53, 78）
- (三)《亡友魯迅印象記》 略號→C
- (四)沒看到原載刊物（含雜誌、書籍，以下同。）的文章→未見
- (五)原載刊物完全不明，以及參考資料雖明記了原載刊物，但需調查是否確屬該刊物者→不明。
- (六)資料所記原載刊物的發行年月日，在無法依據該刊物核對時，發行年月日不予記入。
- (七)西曆則以後兩位數字記入。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36.10.19	(魯迅逝世)		
10.27	〈我所認識的魯迅〉	《新苗》(北平)第11期(36.11)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37.10)
11.8	〈懷亡友魯迅〉	《新苗》第11期(36.11)	A,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月報》(上海:開明書店, 37.1—未見)
12.17	〈魯迅的生活〉	《新苗》第13, 14期(37.1、2)	《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一:二三事》(上海:生活書店, 37.3) A,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重慶:婦女生活社, 41), B—78
12.19	〈懷舊〉	《新苗》第13期(37.1) —未見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
37.3.18	〈魯迅古詩文的一斑〉	《新苗》第16期(37.4)	《許壽裳文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86.9)
5.24	〈魯迅先生年譜〉	《大魯迅全集》第7卷(日本·東京:改造社, 37.6)《魯迅先生紀念集》	《宇宙風乙刊》27期(40.8)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上海:峨嵋出版社, 47)
42.3.12	〈魯迅在杭州任教時的生活〉	不明	不明
4.14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上海:峨嵋出版社, 47.9)	A, B—52, 53, 78
7.8	〈周樹人略傳〉	教育部《中國教育全書》—未見	無
10.17	〈關於兄弟〉	《文壇》2卷1期(重慶, 43.4)	A, B—52, 53, 78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44.5.4	柳非杞編〈《魯迅舊體詩集》序·跋〉	《新華日報》（重慶，44.5.14）（題名〈《魯迅詩集》序〉）—未見 《雲南晚報》（昆明，44.7.30）（題名〈跋尹默手寫《魯迅先生詩鈔》〉）—未見	A, B—52, 53, 78
10.18	〈回憶魯迅〉	《新華日報》（重慶，44.10.25）—未見	B—52, 53, 78
45.10.25	〈魯迅的幾封信〉	《新華日報》（重慶，45.10.19）—未見	B—53, 78
10.18	〈魯迅與民族性研究〉	《民主週刊》第1卷第2期（昆明，46.1.15）—未見	B—52, 53, 78
46.5.18	〈亡友魯迅印象記〉（三則起稿）	一、二章載《民主週刊》第35期（46.6.15）、三章載《民主週刊》第36期	C
46.5.24	〈亡友魯迅印象記〉（寄給許廣平十頁）	四、五章載《民主週刊》第37期	C
6.8	〈亡友魯迅印象記〉（寄給許廣平十一頁）	六、七章載《民主週刊》第38期（46.7.6）	C
6.25	（許壽裳抵臺北）		
9.23	〈亡友魯迅印象記〉（八、九章寄許廣平）	八、九章載《民主週刊》第51, 52期合併號（46.10.10）及《人世間》第4期（上海，47.6.12）	C
9.26	〈亡友魯迅印象記〉（第十章寄許廣平）	載《人世間》第4期（47.6.12）	C
9.30	〈魯迅的精神〉	《臺灣文化》（臺北）第1卷第2期（46.11）	A, B—52, 53, 78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10.?	〈魯迅的德行〉	《僑聲報》(上海, 46.10.14)	A, B—78
10.6	〈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一、十二章寄許廣平)	十一章載《人世間》第4期(47.6.12) 十二章載《人世間》第5期(47.7.20)	C
10.14	〈魯迅和青年〉	《和平日報》(臺中) 46.10.19	A, B—53, 78
10.15	〈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三、十四章寄許廣平)	十三、十四章載《人世間》第5期	C
10.29	〈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臺灣文化》第2卷第1期(47.1)	A, B—52, 53, 78
12.25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12.26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47.3.26	〈臺靜農藏《魯迅講演稿手跡——娜拉走後怎樣》跋〉	無	無
5.4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自序〉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47.6)	A, B—78
5.26	〈亡友魯迅印象記〉(脫稿十五~二十五章寄許廣平)	十五、十六、十七章載《人世間》第6期(47.8.20) 十八、十九、二十章載《人世間》第2卷第2期(47.10.1) 二十三章載《臺灣文化》第2卷第5期(47.8)	C
6.?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出版		
7.28	〈魯迅的避難生活〉	《時與文》第2卷第6期(上海, 47.10.17)及《文藝復興》第4卷第2期(47.11.1)——未見	B—52, 53, 78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9.30	〈魯迅的遊戲文章〉	《臺灣文化》第2卷第8期(47.11)及《文藝復興》4卷2期(47.11.1)	B—52, 53, 78
10.19	《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		
48.2.18	遇害於臺灣大學宿舍		
52.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一版出版		
53.4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二版出版		
78.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三版出版		

參考文獻：《許壽裳日記》、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料》22,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89）、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臺灣文化協進會,47）、同《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47）、同《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52）、王冶秋《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56）、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58）、林辰編《許壽裳文錄》（湖南人民出版社,86）、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紀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36）、袁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卷》（陝西人民出版社,86）、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53）、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78）、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 1-5》（中國文籍出版公司,86）。

從上表可以瞭解移往臺灣的許壽裳，在不滿兩年的時間寫的文章超過以前的十年。《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的約一半，《我所認識的魯迅》的約三分之一，《亡友魯迅印象記》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臺灣時寫的。他所留下的這些著述，或許可說是他一直想寫的魯迅傳之前的結晶。

許壽裳到臺灣赴任那年，正是魯迅逝世十週年。許壽裳履職的約一個月以前的五月二十日，《中華日報》（臺南）的文藝欄〈文藝〉的〈名作巡禮〉欄，刊登了R（龍瑛宗的筆名）的〈阿Q正傳〉（日文）。在此之前，談及魯迅作品的報導很少。魯迅忌日是十月十九日，《中華日報》登載了龍瑛宗的〈中國近代文學的始祖——在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日文），以及楊達的現代詩〈紀念魯迅〉（日文）。《和平日報》（臺中）的文藝欄〈新世紀〉第68期也刊載了幾篇紀念魯迅的文章，許壽裳的〈魯迅和青年〉登在首頁，這是臺灣

初次刊登他書寫魯迅的文章。十一月一日，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誌《臺灣文化》第1卷第2期推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這是臺灣光復後初次綜合性的介紹魯迅，也是當時的新聞雜誌中唯一以魯迅為題製作的特輯。許壽裳應臺灣文化協進會之邀，寫了〈魯迅精神〉一文。十一月四日，《臺灣新生報》（臺北）的文藝欄〈新地〉第49、50期，刊載了雷石榆之紀念魯迅的新詩和朱嘯秋、周青等人的文章。在《臺灣文化》〈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的編輯〈後記〉中，如此寫著：「本省在日人時代，我們不能公然追悼魯迅。雖是去年，因大家忙於慶祝光復，想到魯迅忌日的人很少。今年我們公然紀念魯迅，可說是光復後第一次，《臺灣文化》也特輯這期的紀念號。我們相信，這一本《紀念魯迅特輯》，對於臺灣文化貢獻一定不少。」許壽裳在臺灣介紹魯迅精神，正趕上臺灣光復後「第一次」的公開紀念魯迅。

許壽裳在這兩篇文章中敘述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他談到，魯迅生前稱讚臺灣的青年們支援中國的革命，並且渴望臺灣發起革命，特別是，許壽裳強調魯迅認定革命是改造國民性的必要條件；此外，「抗戰」可說貫穿了魯迅一生的精神，魯迅作品表現的即是此「戰鬥精神」。他再三強調，這是為了民眾的戰鬥，是有計劃性的韌性十足的戰鬥。許壽裳和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時，就常談到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兩人對此深富同感，關於此點，許壽裳在回憶魯迅時再三提及。兩人都共同認識到：中國民族性最欠缺的是「誠與愛」，這病根在「兩次奴於異族，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詳見北岡正子〈另一個國民性議論——給魯迅·許壽裳的國民性議論的影響〉《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紀要》第十號，1989.3）這種論點作為許壽裳的思想持續到戰時戰後的事實，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裡寫的兩首詩尋獲，而在臺灣發表的那些文章的精神亦根基於此。對初履剛解脫日本長期殖民統治的臺灣之許壽裳而言，其文化重建的緊急課題，是改造被日本文化同化的臺灣與改造抗戰勝利後中國人的國民性，兩者關係密切。許壽裳透過談魯

迅的思想，陳述改造國民性問題的重要性，這同時也是許壽裳自身的思想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化》是臺灣文化協進會所發行的會刊，標榜為「綜合文化雜誌」。臺灣文化協進會以「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旨，「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而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1卷1期，1946年9月），站在協助政府的立場，等於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外圍團體。許壽裳任館長的臺灣省編譯館的分內工作，主要是編輯提升臺灣學生國語能力的教科書。但是，臺灣文化的重建，亦即將中國文化移植到臺灣，只靠透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推行國語並不足以達成，借重社會文化團體推行社會教育，及其中心的精神支柱是有必要的。一九四六年六、七月相繼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和臺灣省編譯館，雙雙承擔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構想的臺灣文化重建重責。《臺灣文化》的〈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的〈後記〉表示，許壽裳是最了解魯迅的人，他的文章充分表現了「偉大的導師」魯迅的精神；此外，並以「我們相信，這一本《紀念魯迅特輯》，對於臺灣文化貢獻一定不少」做結語。至此，接受魯迅精神為戰後臺灣的新文化支柱，及視許壽裳為理解魯迅第一人的事實，不語自明。許壽裳積極協助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活動，他和編譯館同仁也時常投稿給《臺灣文化》。他以將魯迅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帶到臺灣為目標，持續實踐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包括到臺灣以後許壽裳所寫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後來由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臺灣省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臺灣文化協進會理事，後來和許壽裳一同成為臺灣大學教授的楊雲萍整理成冊，一九四七年六月以《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為題，交給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此時正是臺灣省編譯館決定廢止，整理殘餘業務之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記寫著：《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冊知已出版。

《亡友魯迅印象記》誕生的經過，亦可從日記得知。許壽

裳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收到許廣平寄來要他為魯迅逝世十年寫回顧文的信。許壽裳手邊的魯迅著作似乎並不齊全，借來《吶喊》、《墳》、《集外集》寫完前三章，是邀稿後一個月。此後又以一面借來《魯迅全集》，一面催促兒子世瑛寄來魯迅的信函完成第七章。第八章以後，是在臺灣寫的。我們認為許壽裳抵臺時，臺灣還沒有《魯迅全集》。許壽裳託人從中國買進《魯迅全集》時是八月下旬，寫完八、九章已是九月下旬，這就是他到臺灣後最初完成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到這一年十二月為止，他繼續執筆包括《亡友魯迅印象記》在內的文章。此時，適值必須使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步向正軌的繁忙期。

翌年一九四七年，有關《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執筆，只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寫著，將十五到二十五章全部稿件交給許廣平，這些原稿可能是從一九四六年年底寫的。根據日記，準備開始寫終章〈病死〉，可能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初之時，四月二日記有〈信王冶秋託鈔許季上輓魯迅詩〉，王冶秋的回信於四月十日寄到。許壽裳喜歡許丹的輓詩〈哭周豫才兄〉。讀了《魯迅先生紀念集》，許壽裳將那首詩的附註連同詩，抄寫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的日記裡。抄下的附註是：「自魯迅逝世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上先生的一首輓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想將這首詩寫進終章，但可能是手邊沒有《魯迅先生紀念集》，所以委託王冶秋抄寫。另外，在引用這個附註之前，有「今紀念集內季上誤作季市，急應更正者」的字樣，看得出許壽裳因被錯認為己而顯得慌張的模樣。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省編譯館工作的受挫、陳儀下臺、臺灣省編譯館被廢止的多事之秋時期，也正是許壽裳著手執筆《亡友魯迅印象記》後半部之際。

根據前述李何林的回想，針對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的文章，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支團部主任委員」為發行人出版的雜誌等，曾予以譴責攻擊。確實，其中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任發行人的雜誌《正

氣》（第1卷第2冊，46.11.1發行），所揭載的遊客〈中華民族之魂！〉則已然不僅是批評，而是對準許壽裳和魯迅作出髒話侮辱和攻擊的文章了。相對於此，許壽裳回以：「《亡友魯迅印象記》得提早完成！」由於他所描寫魯迅在上海十年奮戰情形的文章，間接批判了國民黨內保守派過去的行徑，所以引起他們的不悅。這一章含後半的二十一、二十二章。《亡友魯迅印象記》在許廣平的奔走下，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出版了單行本，比魯迅逝世十週年晚了一年，這一年發生在臺灣的事件，幾乎都是改變許壽裳命運的重大事件。《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後，九月底，書寫的〈魯迅的遊戲文章〉，是他最後有關魯迅的文章。

魯迅精神之接納和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有不可分的關係，它擴及至從大陸購入《魯迅全集》和出版魯迅作品的注解書。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的《國聲報》（高雄）載：「再版《魯迅全集》最近運到一批」的新聞裏，報導了為紀念魯迅逝世十週年再版的《魯迅全集》全二十卷，最近寄達臺灣省，同文並表示，《魯迅全集》或將成為臺灣重要的學術指針。事實顯示，中文版的《魯迅全集》最遲至一九四七年初即已進到臺灣，更進一步，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以不懂中國語的臺灣人為對象，先後出版了以下幾種附注解、日語對譯的魯迅作品：

楊達譯：《阿Q正傳》（47.1，東華書局）

王禹農譯：《狂人日記》（47.1，標準國語通信學會）

藍明谷譯：《故鄉》（47.8，現代文學研究會）

王禹農譯註：《孔乙己·頭髮的故事》（48.1，東方出版社）

王禹農譯註：《藥》（48.1，東方出版社）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原只限少數知識份子的魯迅讀者，就這樣逐漸擴散至各階層。光復後臺灣的魯迅傳播，許壽裳著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許壽裳想把被國民黨敵視的魯迅之戰鬥精神在臺灣發揚光大，本身就是一種伴隨著危險的工

作，而他得以在光復後初期的臺灣如此帶動了魯迅思想的傳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庇護不容忽視。陳儀返回大陸，許壽裳離開臺灣省編譯館，之後，許壽裳只寫了兩篇有關魯迅的文章，這是否透露著什麼？

有關許壽裳之死，前面曾述及許世瑋女士和李何林認為是出自國民黨的政治暗殺，這也說明了實因許壽裳在臺灣大大宣揚魯迅精神，卻暗地裡批判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關係。如此看來，《亡友魯迅印象記》可說是許壽裳的遺書吧？長年牽繫的魯迅傳終究沒能完成，但藉著談魯迅，賭命表現自己思想的這本書，竟巧合的成為兩人友情的證明。

許壽裳逝世後，李何林、李霽野相繼返回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最後留下來的臺靜農也對魯迅三緘其口埋首學究生活。此後，臺灣展開嚴厲的魯迅批判，魯迅作品成為地下文學。臺灣再度展開魯迅研究，是解嚴後的事情。

## 五

許壽裳的日記是當初並無公開意圖的每日生活記錄的累積，然而，整體看來，卻意外地凸顯出一位知識份子在其後半生，戰前與戰後，在文化性歷史迥異的中國與臺灣，遭遇非常時期，並且面對無法迴避的困境挺身持續應戰的誠實姿態。

日記翔實記錄了在戰時大後方的抗日，與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抗爭，波及生活的戰爭實態，以及在光復後臺灣執行文化重建政策及挫折的經過。

青年時代讓許壽裳吸收了各種知識，其中包括侵略他祖國的日本文化。他祈願日本敗北並慶賀戰勝。但是，留學時代習得的日語和日本文化，是日後促使他到臺灣的因素。讀日記，令人想像他的日本經驗，也許是複雜地使他受到傷害，而且導引他走向人生最後方向的肇因。

時至今日，透過其所著魯迅的回憶錄，許壽裳以魯迅代言

人之姿，仍讓我們覺得親切；但是，讀了日記，明白執筆時的狀況後，可看出其實也是表白作者自身的另一個故事。並能從中知曉，在弘文學院和魯迅一同憂心中國國民欠缺的品德——誠與愛，也同時是許壽裳生涯所盼，希望自身體現的美德。

許壽裳在臺灣從事文化重建，以及傳播魯迅思想是表裡一致的事業。這事業一方面是許壽裳有意識地進行的工作，藉涵養此種品德，得以恢復因日本殖民統治而失去的民族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幫助了中國當局在臺灣推展「中國文化本位主義」政策，許壽裳在戰後臺灣寫的日記，也可以看做此一文化本位主義政策實行及挫折過程的紀錄。

日記也可說是，在中國和臺灣和日本的異文化摩擦的三角形之中，一位守著「誠與愛」的知日派知識份子所走過的痕跡。

以上所述，並沒有完全觸及日記的全貌。從今天的研究來看，把它當作歷史資料、社會文化資料、經濟資料、文學資料、傳記資料或氣象資料等等，也都具有令人矚目的豐富內容，這端視讀者抱持的關心和問題而定。

★本「導讀」最初以日文寫成，作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叢刊第64輯《許壽裳日記》（1993年3月）的「解說」，其後譯為中文，先後刊登於《魯迅研究月刊》總147期（北京·魯迅博物館，1994年7月）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8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9月）。本文係根據日文「解說」修改而成。